

【三农问题聚焦】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返乡问题的多维审视*

曹宗平

摘要:受多重因素的交叉影响,农民工被动或主动返乡不可避免,其规模逐步扩大,影响亦日渐显现。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回流,必然会对家乡的方方面面产生显著影响乃至带来一定的冲击。如何激发和放大该群体的积极作用?如何合理引导该项优质人力资本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对接?在全民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形势下,对以上问题的及时回应便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对返乡农民工的整体态势、正反向影响、回流原因、人力资本特质以及功能定位等问题的全面刻画,系统探究和准确辨识相关问题的症结所在,发挥返乡农民工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需要激活其内生动力,提升其综合能力,强化其职业定力,提升其创业的存活率,提高其组织化程度。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乡村振兴战略;多维审视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8-0041-07

乡村振兴战略在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之后,便成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众所周知,如何尽可能激活和释放最切身利益者——农民的内生动力,是该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返乡农民工作为其中的重要人力资本组成部分,其潜在价值自然不可小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经历过四次规模较大的农民工返乡潮,均对特定时期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诸多因素的叠加推动下,近些年来返乡农民工越来越多。为何现实中呈现出这种看似背离城镇化的人口流动态势?这究竟会对乡村振兴战略带来正向促进还是负向拖累效应?应如何积极引导该群体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些问题都亟待系统研究。

一、对农民工返乡带来影响的差异化解读

尽管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意外冲击,2020年我国农民工人数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但基数仍然高达

2.86亿人。^①近些年来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返乡农民工的人数逐年增加,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重要影响。至于如何评价农民工回流现象,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1. 农民工返乡的总体态势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市场得以逐步放开并快速发展起来,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频繁流动成为常态。只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的四十余年中,农村劳动力从乡村进入城市、从内地流入沿海是绝对主流,所以人们对于其间从未中断过的零散的、小规模农民工返乡现象关注甚少。这里不妨全面梳理此阶段所发生过的几次具有较大影响的农民工返乡潮。

基于时间维度审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过四次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农民工返乡潮。第一次发生在1989—1991年。迫于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我国开始开展治理整顿,严惩贪污腐败,积极回应民众呼声,经济发展速度随之一度放缓,一些农

收稿日期:2021-05-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防控机制与治理对策研究”(18AJY020)。

作者简介:曹宗平,男,华南师范大学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510006)。

民工眼看城市就业无望只得选择暂时返乡。第二次发生在 1998—2000 年。由于当时国有企业改革和乡镇企业改制都进入攻坚阶段,大量城镇职工下岗。为了解决辖区内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难题,许多城市当局纷纷出台具有地方保护色彩的歧视性就业政策,一些农民工被城市就业市场排挤乃至屏蔽,不得回流。第三次发生在 2008 年。当年肇始于美国、随即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低迷,作为外贸依存度高企的中国必然无法置身事外,许多外向型企业订单骤减,致使就业需求大幅萎缩,农民工城市求职艰难,一些人被迫返乡。^②第四次发生在 2020 年。一场始料未及的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并迅速蔓延全球,随后数月内世界经济几乎陷入停滞,工厂停工、市场停业、学校停课、交通停运。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形势可想而知。一直等到各地解除封城禁令后,一部分滞留异地数月的农民工才得以“逃回”家乡。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第三次和第四次返乡农民工中包括了一定数量的主动返回者。随着家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各地鼓励和支持回乡创业的优惠政策先后落地,一些打工者也敏锐地发现了返乡创业的诸多商机,因此选择主动回流。

系统回顾我国历次较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发现其呈现以下四个典型特征:一是规模上由小到大,即从零星的、个别的回流向规模化、群体性的返乡转变。有学者研究揭示,最近五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占全国返乡创业人数的比重一直高居 80% 左右^③;二是时间上由短变长,即农民工返乡滞留时间从数天、数周向数月、半年乃至更长转变;三是空间上由远到近,即农民工中异地返乡人数更多,本地就业者的返乡态势则相对平稳,近几年农民工更倾向就近就业由此也可见一斑;四是形态上由被动到主动,即从几乎全部的回流者由异地就业失败而被动返乡向部分人开始主动放弃打工而返回家乡就业创业转变。

2. 对农民工返乡现象的不同诠释

随着农民工返乡渐成规模,其对诸多方面的影响也日益显现出来。目前对于该现象主要有两种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农民工返乡打破了家乡多年形成的利益格局,引发了相关主体的困惑和焦虑,似乎成为阻碍乡村发展的额外负担;另一种观点提出,农民工返乡给家乡提供了稀缺性人力资本,为农村发展

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俨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意外收获。下文将对这两种观点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其内在的偏颇和中肯与否。

第一,额外负担论。一些人对返乡农民工总体上负面评价较多,其理由主要包括:首先,返乡农民工加剧了家乡就业市场竞争的激烈性。随着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农业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排斥,返乡农民工的加入无疑加重了家乡有限就业岗位的拥挤程度,引起家乡就业失败者的抱怨和抵触。其次,返乡农民工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该群体往往选择自家多年弃耕或者别人常年撂荒的那些地理位置便利、土地肥沃的地块耕种,导致耕地进一步碎片化,增加了规模化经营难度,且仍然沿袭传统耕作方式,这显然与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背道而驰。再次,返乡农民工增加了乡村治理的不确定性。该群体人数多、诉求杂、个性张扬,社会活动参与度高,他们动辄结合自己外出务工的丰富阅历,对家乡建设的诸多方面提出异议,时常让基层管理人员陷入尴尬境地。最后,返乡农民工提高了基层舆情防控的难度。该群体总体上见识广,维权意识强,往往是村民的意见领袖,遇到家乡不平之事,敢于发言,善于利用抖音、快手、微信等新媒体发声,一旦某些负面信息在网上传开,地方政府一时百口难辩,疲于应对各种舆情,处境十分被动。

第二,意外收获论。首先,短期内农民工返乡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会激化家乡就业矛盾,但从中长期来看情况未必如此。返乡者更可能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家乡开展形式多样的创业活动,通过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和促进三产融合等多种途径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拓宽就业空间,扩充就业总容量。其次,返乡农民工之所以选择优质地块耕种,是因为这些土地本来就闲置多年,既然是近乎零成本耕种,当然更愿意选择耕作便利、产出率较高的地块。如果原承包人索要自己的土地自种或者转租,他们也自然就依法依规归还,不会影响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同时,在城市打拼数年,该群体更能体会到知识、技能和时间的价值,返乡务农时尤其注重运用现代科技和先进农业机械,从而更有利于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④再次,该群体曾经长期外出打工,数年中耳濡目染“城市人”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逐步形成了规则意识和法制观念,回流后更热衷家乡建设,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建言献策,敦促基层管理者集思广益,避免

决策的盲目性,某种程度上反而倒逼基层政府提高决策能力,从而显著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最后,该群体热心家乡建设,积极参与各项事务,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乡村社区管理的内卷化和封闭性,无形中增加了基层管理者的风险意识,迫使其优化管理流程,主动把部分管理职能前置,注重事前多与利益相关者交流互动,推动地方政府广纳民意,化解误会,把矛盾解决在基层,最大化降低事后的纠偏成本。因此,该群体的回归非但不会增加家乡舆情防控难度,反而有助于提高基层管理水平,构建和谐干群关系。

近几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工作,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实现三产融合、城乡一体化发展,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两年多的相关实践证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最大瓶颈就是缺乏优质人力资本。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调研时就曾提出:“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可见,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返乡农民工是值得期待的重要力量。事实上,只要引导得力、统筹得法和激励得当,返乡农民工的确是乡村振兴中最稀缺、最坚实的人力资本。

二、乡村振兴中人力资本的类别及其特征

实现乡村振兴必须依靠优质的人力资本,该群体从何而来?这里不妨系统区分目前农业劳动力的主要类型,并简要描绘其各自的特征。整体上看,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大致可以划分为五类,即老年农人、外来农人、兼职农人、专职农人和返乡农人。由于生活背景、从业经历以及个人期望的差异,这五个群体在对待农业的态度上表现出迥异的特征。

1. 老年农人——有心无力

老年农人即第一代农民工的父辈,年龄在75岁左右。该群体一方面故土情怀浓,不想离开家乡,恋农情结重,不愿放弃农活儿^⑤;另一方面也没有其他更好的谋生办法,为了减轻子女们的抚养负担,他们一直坚守农村,不辍劳作。无奈岁月不饶人,对于繁重的农业生产,他们愈来愈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上耕种方式长期固化,只能勉强应付农业生产,遑论农业的效率和效益。

2. 外来农人——有力无心

外来农人即随着商业资本下乡,从各地雇用而

来的一定规模的农业劳动力。不可否认,商业资本的确实力雄厚,但其逐利本性决定了它更青睐赚快钱。农业作为弱质产业,投资量大,回报期长,收益慢,风险高,并不是商业资本的首选。一些商业资本之所以热衷投资农业,更多的是为了享受某些政策优惠,一旦利好政策接近尾声,可能就抽资或者撤资转向其他领域,随之而来的外来农人也只好“各奔前程”。显然,该群体更多地类似于新型农业工人,个人收入最大化是其追求的目标,至于在什么地方从事何类工种并不重要,他们缺乏专注农业的恒心。

3. 兼职农人——三心二意

兼职农人即在城镇打工与农村务农之间作钟摆式流动的两栖农民。由于家庭负担、风险偏好、健康状况等多重原因,许多农民选择兼业化的工作生活方式,农忙时在家种地,农闲时进城打工。相对于在家务农,进城务工性价比更高。现实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个判断。长期以来我国农户家庭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占比最高,目前超过经营性收入约15个百分点(见图1)^⑥。因此,兼职农人的主要精力实际上更多投入到打工上,无心专注农业生产,也不会奢望较高的劳动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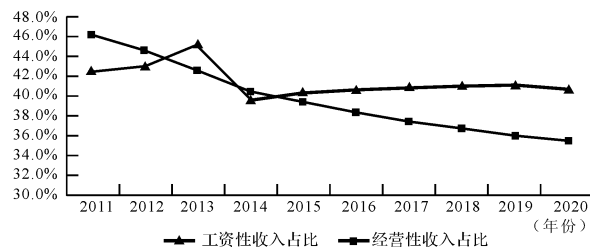


图1 2011—2020年我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4. 专职农人——心灰意冷

专职农人即那些始终留在家乡务农,既没有到异地打工,也没有(至多偶尔)在本地城镇兼职的农民。传统农业基本靠天吃饭,自然风险大。同时,农产品需求弹性小,丰产不丰收仿佛成为解不开的死结。再者,各级政府往往重前期产业化种养、轻后期规模化销售,其结果是进一步恶化了区域性同质化农产品的竞争环境,导致大量农产品滞销、价格暴跌,经常出现“起早贪黑一整年,精打细算不挣钱”现象。数年中如此三番五次地折腾,许多专职农人屡遭打击,多次萌生外出打工念头。还有,近些年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农业综合成本增加,务农的利润空

间越来越逼仄。无奈由于自身职业技能锁定,难以找到其他合适的就业门路,只能选择苦苦坚守。需要说明的是,专职农人还包括一部分留守妇女,由于受到照顾老人和看护孩子的羁绊,她们无法随配偶进城务工,为了尽量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在陪伴家人之余,她们顺便粗放式种植少量口粮田。

5. 返乡农人——一心一意

返乡农人又可以细分为两种人,第一种人属于打工一族中的失意者。他们外出打工多年,深刻体会到四处谋业、居无定所的艰辛,在城镇就业岗位萎缩、求职受阻被迫返乡后,反而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淡定与执着,从此心无旁骛,专注农业生产。第二种人则属于打工一族中的幸运者。他们异地务工数年,积攒了不菲的资金,掌握了独特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的人脉,为了长期与家人团聚,抑或报答故乡亲老的养育之恩,利用老家就业创业的优惠政策,选择主动返乡。他们有能力、动力和定力把事业搞好,更有信心、决心和爱心把家乡建设好。

对比分析后不难发现,在承载众多期盼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哪类农人更值得信赖。近期来看,如果要发挥农民的内生动力,真正靠得住的非专职农人和返乡农人两个群体莫属,他们是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尤其是后者所蕴含的潜能更值得期待。

三、农民工返乡的主要原因分析

农民工作为“理性人”,其返乡行为必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内在驱使和外在挤压。其实,自从“农民工”这个专有名词诞生以来,就存在农民工返乡现象,只是当初人数少、影响小,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随着农民工返乡人数逐年增加,其波及面越来越广,才开始引起大家热议。为何近些年这种现象日趋显性化和规模化?其中的原因值得深究。现有文献虽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农民工返乡的各种意愿,但总体上过于零碎,缺乏系统性,笔者在此不妨进一步进行归纳和提炼。

1. 被动层面的缘由

首先,随着各类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传统的低端制造业逐步被淘汰或转移,与农民工能力特质所对应的就业岗位不断萎缩,寻找工作的难度持续加大。^⑦其次,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新冠肺炎疫情意外冲击等不确定因素导致订单减少,许多企业被迫压缩生产规模,减少用工人数。再次,大中

城市的房价、物价、通勤费用不断上涨,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农民工耗不起漫长的求职等待,只得惆怅地返回家乡。再再次,第一代农民工基本上到了 60 岁左右的年龄,职业技能已经达到天花板,昔日年龄上的优势也不复存在,很难再找到中意的工作,一些人不得不返乡。最后,第二代农民工虽然仍具备一定的年龄优势,但是始终无法割舍对老家长辈健康和子女教育的牵挂,一旦外地就业受挫,其中一部分人便会考虑返乡就业创业。

2. 主动层面的缘故

首先,家乡就业创业机会增加的诱惑。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各项优惠政策陆续出台,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日臻完备,一些东部地区或者大中城市的传统产业转移而至,农民工不出远门便可就近就业,还省却了异地求职的艰辛和其间不菲的开销。同时,随着家乡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各项扶持政策激励效果显著,宝贵的商机屡屡出现,吸引着部分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⑧其次,家庭追求偏好变更的影响。一些农民工外出务工数年,手头积攒了一定的资金,多挣钱已经不再是家庭追求的唯一目标,起码不是最重要的目标。留守老人凄凉的晚年生活以及留守儿童残缺的童年场景频频见诸各种媒体,不断消磨着农民工困守城镇的毅力,其中一些人终究没能熬过内心的苦闷,选择回到农村与家人团聚,以便尽量弥补长期分离所沉淀下的心理愧疚。再次,在家就业与异地打工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随着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全国统一、开放、竞争、自由、流动的要素市场逐步形成,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间的工资水平总体上日渐趋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尽管目前就近就业的工资收入在额度上可能仍低于异地打工所得,但是如果把异地就业的交通成本、生活成本再加上远离家人的心理成本一并考虑进来,家乡就业创业的综合收益则更加实惠和划算。最后,其他返乡者成功创业的示范。一些返乡农民工充分发挥自己在观念、资金、技能和人脉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利用家乡支持返乡创业的各项优惠政策,率先开展创业活动。由于起步早、脑子灵、市场定位准,他们更容易创业成功。羡慕身边某些返乡创业者事业有成,其他农民工也欣然踊跃尝试,希望通过模仿和超越来实现内心深处掩藏多年的“当老板”的小目标。

四、返乡农民工的基本定位

同样地,既有文献也大量论及返乡农民工的作用,然而更多停留在表层上,且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毋庸置疑,一定规模的农民工返乡,必然会对家乡的就业安置和社会治理带来某种程度的压力。然而,如果从多维度考量该群体的回归,可能会得到更全面的认知和更有价值的启迪。

1. 返乡农民工的双重身份

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返乡农民工对于家乡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首先,作为生产者,该群体在城镇打拼多年,掌握了某些非农岗位技能,返乡后就近到转移至当地的传统企业就业,既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又可以享受与家人相聚的天伦之乐,同时满足了这类企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即使是一部分返乡者重操旧业,投身农业生产,作为见过世面的新型农民,他们更倾向于采用现代化、产业化的经营模式,这对于农业稳步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都非常关键。其次,作为消费者,在多年的异地打工生涯中,该群体积攒下一定的资金,返回家乡后的建房、购房或者创业等相关投资行为都有利于活跃农村市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再者,该群体的消费习惯更接近城镇居民,近年来后者的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2倍左右(见图2)。可见,该群体的回流将有助于拉动和放大当地的消费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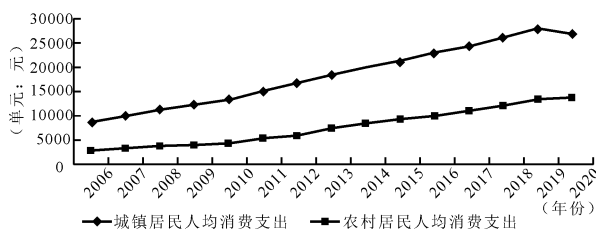


图2 2006—2020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2. 返乡农民工的三项资本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他们将家乡经济社会发展潜心投入三项重要资本。首先是物质资本,即该群体多年外出务工攒下了颇丰的资金。伴随着回归家乡,他们有能力在当地进行较大额度的消费性和生产性投资,二者均有利于激活和放大农村商品市场,从而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进行。其次是人力资本,即该群体的数量规模和能力素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有一定量的在技

能禀赋上具备比较优势的劳动力支撑,该群体的回流恰好契合了这种需求。最后是情感资本,即该群体返乡后无论是就近就业还是自主创业,都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因子。若选择在本地就业,那么几乎天天都能与家人相处,尽情享受其中的幸福欢乐,工作情绪饱满,劳动效率高涨;若选择在家乡创业,则极易把创业项目的成败与个人发展、家庭致富乃至家乡振兴紧密结合起来,这种内在激励使其心甘情愿地投入更多精力和时间。笔者调研发现,在热心和支持乡村振兴的众多投资主体中,真正想把事业做大做强做久的群体正是返回故里的乡贤,其中不少恰恰就是返乡农民工。诚然,城市商业资本下乡可能有推动乡村振兴的意图,但其主要目的还是赢利,且越快越多越好,此乃资本的逐利本性使然,无可厚非。众所周知,农业是弱质产业,投资量大,回报期长,潜在风险多,相关领域的投资原本就不是商业资本的青睐对象,只是受到某些倾斜性政策的诱惑,一些商业资本才开始关注并试探性地进入农业,但更多的仅仅是权宜之计,其运营的长久性难以判断。相比之下,一些返乡农民工中的佼佼者有实力、有能力、有动力和有耐力投身家乡建设,他们才是支撑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

3. 返乡农民工的多维贡献

第一,农民工返乡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返乡农民工经历过现代城市文明的洗礼,逐步形成了乡村社会发展最为稀缺的时间观念、市场观念、法治观念、学习观念以及相应的行为范式,这必然对乡村社会所固有的小农意识、宗族观念、人情世故和封闭格局产生巨大冲击,进而引导人们逐步摒弃这些陈旧落后的思想。这些理念和行为上的嬗变,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风文明”目标尤为重要。同时,一定量的农民工返乡正好有利于解决乡村振兴中普遍性的农村人口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其隐形价值不可估量。

第二,农民工返乡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有人质疑,农民工返乡与新型城镇化在人口流向上呈现出明显背离,甚至认为这是我国“逆城市化”来临的先兆。事实上,远非如此。现实中农民工返乡并不都是直接回流至其出生的自然村,而是绝大部分回到其户籍所在地的县城或者中心镇。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返乡农民工在外地打工多年,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有能力在县城或者中心镇购房或建房,且

他们已经适应了城镇生活,真正回到农村定居非常不习惯。其二,县域内的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商业资源几乎都集中在县城,考虑到孩子求学、老人就医和自己就业,返乡农民工自然倾向于县城居住。其三,与大城市婚配市场上女多男少的状况相反,农村婚配市场上男多女少,大龄剩男越来越多,男方在县城有无房产几乎成为女方是否答应相亲的标配,这种严峻的现实对于特别注重传宗接代的“农村人”影响非同小可,考虑到孩子的未来婚姻,返乡农民工会本能地选择到县城购房居住。显然,农民工返乡更有利于推进“人”的城镇化。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一直保持着年均约 1% 的增速。最近 15 年间即使发生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也丝毫没有影响集中型城镇化的总体趋势(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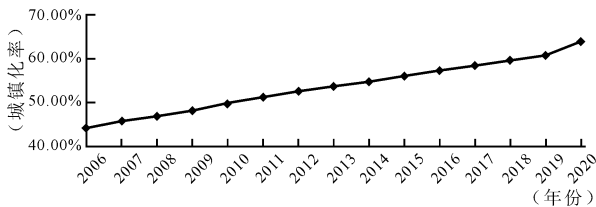


图 3 2006—2020 年中国城镇化率基本走势

资料来源:各年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第三,农民工返乡有利于降低城乡综合治理成本。随着各类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传统类企业的“关停并转”成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争端进一步恶化了外向型企业的处境,加之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农民工异地求职竞争日渐激烈。受到与自身技能相匹配职位供给增速减缓的影响,一定规模的农民工必然无法及时找到工作。他们如果长期滞留城市,为失业所苦恼,为生计所困,为奔波所累,难免会有少数人走上违法犯罪之路,无疑将加大城市社会治理难度。在此种情境下,倘若能够引导一部分城市就业不顺的农民工有序返乡,则可以大大减缓城市管理的压力,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宽松的环境和更广阔的空间。同时,这些农民工返乡后既可以就近打工,也可以在家务农,还可以自主创业,各自都谋得一份相对固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拥有更多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孩子成长有陪伴,长辈生活有保障,勾勒出一幅温馨祥和的“少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依”的乡村幸福图景,无疑降低了乡村社区的治理成本。

五、促进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的对策措施

返乡农民工作为优质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将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该群体在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可以重点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 激活返乡农民工的内生动力

外因虽然重要,但毕竟要通过内因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乡村振兴战略成功实施的关键也同样取决于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基于此,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准、优化营商环境便显得特别重要。政府要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的扶持力度,使该群体就业有岗,创业有方,务农有赚头,打工有劲头,创业有奔头。^⑨唯有如此,才能为乡村振兴中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本后盾。

2. 提升返乡农民工的综合能力

农民工返乡后无论是选择务农、打工还是创业,都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虽然一些农民工在长期外出务工的磨砺中学会了某项技能,但该技能与其返乡后所从事的新工种未必完全吻合。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工需求,为返乡农民工开展针对性的知识和技能培训,把一批返乡农民工培养成拥有复合技能的新型职业农民。同时,考虑到其中一部分人的创业意愿,政府还应不定期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或者当地小有成就的企业家举办法律、电商、风控、决策、创新等方面的创业辅导和专题讲座,提高创业者的专业素养和管理能力。

3. 强化返乡农民工的职业定力

农民工在陌生的城市打拼多年,几乎都曾遭受过莫名的歧视、冷遇与排挤,愈加怀念和珍惜家乡的博大情怀与无私包容,回流后对于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自然多了一种无形的亲和力和注意力。该群体怀揣着满满的感恩和回馈情愫积极参与家乡的乡村振兴工作,愿意为家乡建设倾注更多心血。当然,作为“理性人”,该群体在择业过程中必然也要进行成本收益比较,毕竟再美好的理想也必须根植于现实之中才具有可行性。鉴于此,扶持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的相关政策必须具有持续性和连贯性,使得该群体形成清晰的预期,从而坚定提升技能和追加投资的信心。

4. 提升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存活率

农民工返乡创业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行为,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学习过程,从项目筛选、资金筹措和土地调配,再到工厂选址、员工培训和产品销售,乃至企业暂时陷入困境时的积极救助等全过程,政府给予必要的引导和扶持非常重要,但是必须坚持“不缺位、不越位”的适度性原则,避免过度呵护。企业在初创时期,由于实力孱弱、产品竞争乏力、发展前景模糊,政府的适时帮扶显得弥足珍贵。随着创业企业经营活动走上正轨,政府就要保持克制,学会逐步放手,不再过多干预企业的日常运作,其职能定位也要尽快回归到政策引导和行为规范上,遵循市场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唯有如此,才能确保那些经历残酷竞争的创业企业基业长青。

5. 提高返乡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

返乡农民工创业项目规模小、类别杂、分布散,创业者之间缺乏沟通和协调、信息严重不对称,彼此间高度同质化的产品为了争夺有限市场而展开激烈竞争,其结果往往是一场相互伤害的零和博弈,而不是总体福利的帕累托改进。破解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天然矛盾,一直是困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硬核问题。目前来看,最大化规避这种内耗的可行性办法就是提高返乡创业者的组织化程度。可以考虑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搭建各种合作平台,引导返乡创业者与当地既有企业主积极对接,促进其充分交流,通过构建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公司+农户”、家庭农场、战略联盟等多种运营模式来提高生产经营的规

模化、产业化和组织化水平,从而夯实创业者的议价能力,借此最大化降低市场波动风险,增加创业成功的概率。^⑩同时,探索成立商会、行业协会等组织载体,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机制,倡导行业自律,保证产品质量,实现错位发展,消除特定区域市场的同质化恶性竞争。依托各种中介组织,游说当地政府出面在发达地区成立同乡会,打好乡情牌,为创业项目招商引资牵线搭桥,也为家乡土特产拓宽销路。

注释

①《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shuju/2021-04/30/content_5604232.htm,2021年4月30日。②李彦娅、谢庆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三次返乡创业高潮的调查》,《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③李周:《农民流动:70年历史变迁与未来30年展望》,《中国农村观察》2019年第5期。④贺小丹、董敏凯、周亚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回流与农村资源配置——基于农民工返乡后行为的微观分析》,《财经研究》2020年第8期。⑤贺雪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问题》,《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⑥从2013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2013年及以后数据来源于此项调查。这与2013年前的分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的调查范围、调查方法、指标口径有所不同。⑦党国英:《关于乡村振兴的若干重大导向性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2期。⑧石丹浙、王轶:《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工返乡创业质量影响因素及其政策促进》,《求是学刊》2021年第1期。⑨杨秀丽:《乡村振兴战略下返乡农民工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构建》,《经济体制改革》2019年第7期。⑩曹宗平:《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衍生机理与治理研究——基于从众效应与风险识别能力维度》,《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责任编辑:澍文

Multidimensional Reflections on Migrant Workers'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ao Zongping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factors, it is inevitable for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home passively or actively. Its scale is gradually expanding, and the influenc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With the return of more and more migrant workers, it is bound t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all aspects of their hometowns and even bring about a certain impact. How to stimulate and amplify the positive role of this group? How to reasonably lead the high quality human capital to effectively connect with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Under the situation that the whole people fully promot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timely response to the above problem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 return reasons, human capital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and accurately identifies the crux of relevant problems.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ate their endogenous power, upgrade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strengthen their professional determination, increase their entrepreneurial survival rate and improve their degree of organization.

Key words: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multidimensional reflections